

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

译文集

第十二辑

〔内部参考〕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研究所 历史室编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前 言

为了进一步研究我国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我们拟选译选印一些国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和论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每辑基本上围绕一个专题，并附上有关参考论文索引，供研究、批判时内参参考。

这是一份内参参考资料，所选译文，有些尚有一定史料参考价值，但绝大部分都渗透了帝、修、反的反动观点。特别是近些年来苏联史学界的文章，更是苏联霸权主义猖狂反华的组成部分，对此，我们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此项工作系初次尝试，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不当之处，请见到此资料的同志提出宝贵意见，以便我们不断提高译文和编辑质量。

引用所载译文时，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目 录

一、十七世纪三十～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 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概述）

（苏）M. N. 戈尔曼

F. N. 斯列薩尔丘克

二、十七世纪中期俄罗斯与唯噶尔往来关系 史的档案文书

（苏）F. N. 斯列薩尔丘克

三、《俄蒙关系历史资料（1607～1636）》

一书之绪论（附该书所收文献目录）

（苏）N. G. 兹拉特金

四、《俄蒙关系历史资料（1636～1654）》

一书之序言（附该书所收文献目录）

（苏）M. N. 戈尔曼

F. N. 斯列薩尔丘克

附：

一、亟应重视的动向

—— 苏联史学界利用沙俄档案资料
研究准噶尔历史情况简介

二、近三十年来苏联发表的有关准噶尔历史的
著作与论文索引

蘇聯
學界
研究

一、十七世纪三十——五十年代

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概述）

〔苏〕 M. И. 戈尔曼

Г. И. 斯列萨尔丘克

十七世纪三十——五十年代，俄国不仅与从十七世纪初就有联系的准噶尔（或称卫拉特）和阿勒坦汗国，而且和喀尔喀地方地区进一步扩大和巩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而和喀尔喀的联系，又促成了莫斯科后来——十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和别的蒙古领主即土谢图汗和扎萨克汗建立直接联系。

此外，在三十——五十年代，满洲人对南下蒙古独立的威胁，日益加剧。满洲朝廷开始干涉北方蒙古的内政⁽¹⁾。满洲人在蒙古封建主之间，特别是在喀尔喀一带⁽²⁾加紧煽动内讧。但是，内蒙古诸汗国和公国则利用外交手段或公开反抗的方式，继续维护其独立。

十七世纪三十——五十年代，这是各个争夺国家政权的封建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划分势力和谋求稳定的年代。正是在这个时期（1635年），在蒙古领地左侧边区成立了准噶尔汗国这个强大的封建国家，它在以后的一百年间对中亚各民族的历史

史命运起过重大的影响。⁽³⁾

以和鄂尔勒克为首的土尔扈特人，由于对自称为全卫拉特汗的巴图尔珲台吉的兴起感到不满，自在葛尔出关，三十年代在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定居下来。和硕特人也随图鲁拜琥（硕实汗，1582—1654年）离开住葛尔，在青海地区建立了独立的汗国。

阿勒坦汗国位于蒙古西北部。以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二十年代末—1657年）在位时期最为强盛。车臣汗硕垒（1577—1650年）、土谢图汗索布多尔济（1655年卒）和札萨克汗素巴第（1651年卒），则继续向东扩展领地，蒙古这卫分地区的其余公国，都臣服于这三个实力最雄厚的汗。这几个汗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独立程度，都已是可推行独立的政策，并可与俄国和清廷建交，和它们签订临时协定。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封建生产方式即自然经济结构占统治地位，不存在经常性的经济交往，等等。涣散的游牧畜牧业是经济的基础。

在他们国内，喇嘛教占统治地位，是统治阶级在封建割据条件下统一思想的主干。喇嘛教寺庙渐渐成为在蒙古内外史上起过重大作用的最强大的政治力量。蒙古经济实力的基础，

也是在这些年代中逐步形成的。封建统治上层从物质上慷慨接济喇嘛教寺庙。封建主不仅以资财兴建喇嘛寺，送儿出家当喇嘛，而且赐给教父们（*Агхобхиле отцы*）牧地和一部分处于奴役地位的阿拉特，从而形成了“沙比纳尔”这个特殊阶层——寺院封建主的农奴。喇嘛们越来越热衷于参与国内的政治生活，蒙古和邻邦关系的性质也受它们的影响。

这就是十七世纪三十一—五十年代蒙古内外形势的梗概。这是一个对以后蒙古的全部历史起过重要影响的时期。由此可见，研究集存于苏联各档案馆的文献资料，主要是研究集存于莫斯科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和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的文献资料，其意义之重要，也和研究其他史料一样（4）。

俄国档案文献几乎是这一时期俄蒙关系史的唯一资料来源，因而其意义也就更重大了（5）。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馆和科学院档案馆所收藏的文书，包罗万象，极为丰富（沙皇致蒙古诸汗和台什的国书，沙皇致西伯利亚军政长官的公文和谕旨，去蒙古的使团军役人员的情况报告和出使报告，莫斯科和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托木斯克、塔拉等城市接待蒙古使臣的记录，西伯利亚军政长官致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的复文、训令等），

对俄国同蒙古诸汗国和公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的历史和性质，作了完整的描述；对当时蒙古人内卫生活，也有大量饶有兴趣的记载，可说是涉及到了所有的问题。其中某些史料在革命前和苏维埃时期的史学家著作中，都曾加以引用⁽⁶⁾。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朝鲜越南蒙古卫编了一辑自1606至1689年这段时期的《俄蒙关系史文献》，其中很大一部分文件从未发表过。1959年出版的第一卷《俄蒙关系史文献》收编了自1607年至1636年的文件⁽⁷⁾。这一汇编，无论在苏联或是在国外，都得到很高的评价⁽⁸⁾。第二卷，正在筹印尚未发表。本文作者根据这种情况，同时考虑到，各个研究人员所使用的文献，並沒有反映出极为丰富的俄蒙关系文献的全部内容，因此，著文的目的力求较全面地概述上述档案库集存的这个时期的档案文献。

俄国档案文献证明，在十七世纪三十一—五十年代这个时期，俄国和蒙古的使臣来往很活跃。俄国同阿勒坦汗、准噶尔汗国和车臣汗一直保持着正常的外务关系。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和他的教父达育·墨尔根兰珠时森以及他的弟兄们、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和车臣硕垒派出了许多使团，来到西伯利亚的托木斯克、托博尔斯克、塔拉、秋明和克拉斯诺

雅尔斯克等城市，其中大卫分使团后来又派往莫斯科，根据沙皇政府的公文和命令，俄国也相应派出使团回访。此外，西伯利亚军政长官根据沙皇的命令，也单独与卫拉特封建主固始台计、岱青、樊琬尔、阿巴赖台什、达音翁博等人交换使臣，数次交换一定知照莫斯科。

关于俄国政府在这个时期内同阿勒坦汗俄木布顿尔德尼和达音、墨尔根兰珠的来往情况，保存了四份出使报告⁽⁹⁾；它和巴图尔珥台吉的来往情况，计有派往准噶尔的军役人员的七份出使报告、情况报告和咨询谈话记录⁽¹⁰⁾；它和车臣汗硕垒的来往情况，计有三份情况报告和咨询谈话记录⁽¹¹⁾。此外，有许多文献是谈俄国人去卫拉特各个台什外和帖良古惕兀（Теленгуты）的情况⁽¹²⁾。

但是，频繁交换使团的情况，不能只依据保存下来的出使报告、情况报告和咨询谈话记录来判断。西伯利亚军政长官致外务衙门和西伯利亚衙门、致喀山宫衙门（Приказ Казанского Палаты）的许多复文，也很重要。在这些复文中，记述了许多军役人员咨询谈话的内容。他们通常都是陪同蒙古使臣自蒙古去俄国，或是自俄国去蒙古，也有的是奉军政长官之命去蒙古兀鲁思的。某些纪行情况，只有在军政长官致各个衙门的复

文中才见得到。

军政长官们关于蒙古使臣至各西伯利亚城市的出使报告、官署和外务场所接待他们的记录以及军政长官和因种种原因未能去莫斯科的使臣们谈判的情况报告，都十分重要。

1636年8月，以托木斯克军役贵族斯杰潘·格列切宁和书吏安德烈·萨姆索诺夫为首的使团，被派往阿勒坦汗处⁽¹²⁾。与此同时，托木斯克还组成了一个使团，奔赴达音·墨尔根兰珠刺麻处，由托木斯克军役贵族B·卡尔塔舍夫和书吏格拉西姆·季莫贵耶夫领导。这两个使团都于1637年4月返回托木斯克⁽¹⁴⁾。随同他们一起抵达的还有蒙古使臣墨尔根德嘎及共同僚，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阿勒坦汗亲属，蒙古大封建主杜拉尔塔布囊。这次隆重会见以及杜拉尔塔布囊和墨尔根德嘎在托木斯克停留的情况，在托木斯克军政长官И.И.罗马诺夫斯基关于他们出使情况的报告中，均有详细记载⁽¹⁵⁾。1637年6月中旬，阿勒坦汗和达音·墨尔根兰珠刺麻的使臣，获准去莫斯科，由军役贵族B·斯塔尔科夫陪同，先后受到外务衙门和沙皇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的接见⁽¹⁶⁾。使臣们递送了阿勒坦汗⁽¹⁷⁾和他的孩子们⁽¹⁸⁾以及他的兄弟岱青诺颜⁽¹⁹⁾的礼品和书信，还递送了阿勒坦汗兄弟达音诺颜⁽²⁰⁾、额尔登诺颜⁽²¹⁾

示达音·墨尔根兰珠喇嘛⁽²²⁾要求给予赏赐的申请书。

1638年9月，B. 斯塔尔科夫率领的使团，前往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处⁽²³⁾，托木斯克军役贵族C. 涅维罗夫率领的使团前往达音·墨尔根兰珠喇嘛处⁽²⁴⁾。使臣们在蒙古兀鲁思停留了半年多时间，到1639年4月才返回。蒙古回访的使团由布达特巴克士和科尔切格巴克士率领⁽²⁵⁾。他们给莫斯科递送了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和达音·墨尔根兰珠喇嘛的国书，向沙皇陛下赠送了以下礼品：200张貂皮、银圆钱⁽²⁶⁾。但是，由于阿勒坦汗对待俄国使臣B. 斯塔尔科夫和C. 涅维罗夫的态度不友好，莫斯科没有接受礼品。1641年1月16日，上谕“阿勒坦之使臣可去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城，由托木斯克返回阿勒坦王处”⁽²⁷⁾。1642年，使臣们在托木斯克稍事停留后，即返回蒙古⁽²⁸⁾。

在C. 格列切宁、B. 卡尔塔舍夫、B. 斯塔尔科夫和C. 涅维罗夫的出使报告中，细述了使团的任务、过程、同阿勒坦汗和达音·墨尔根兰珠喇嘛谈判的内容与结果。这里只可以说，这两个使团都没有达到自己的主要目的——由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自己来确认他在1634年的宣誓。因此，在1657年以前，莫斯科和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之间暂行交换使团。

不过，俄国和阿勒坦汗国之间的联系，並沒有中断。1645年5月一开始，蒙古人达尔罕喇嘛和阿勒奇台就携带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书信和礼物来到了托木斯克⁽²⁹⁾。俄木布额尔德尼在致沙皇米哈依尔·费奥多罗维奇的信件中，提议恢复交换使臣⁽³⁰⁾。不久，就有使臣动身去蒙古。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的提议，並沒有马上得到答复。托木斯克军政长官O. N. 谢尔巴托夫于1647年给外务衙门的复文中，提到了阿勒坦汗使臣墨尔根德屯抵达托木斯克的情况，他是来证实阿勒坦汗有愿与俄国维持睦邻关系的。托木斯克军政长官认为使臣们是来从事侦察活动的。没收了他们随身带的货物，还把他們长期扣留在城里⁽³¹⁾。阿勒坦汗得知此事后，于1648年6月派出新的使臣，让他带一封给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的信，信中控告托木斯克军政长官的行动，并要求派遣俄国使臣到他那里去⁽³²⁾。1650年，托木斯克官署重新接待墨尔根德屯及其同僚，墨尔根德屯这次是受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委托，前来祝愿“沙皇陛下和金俄罗斯大公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健康长寿”。同时，很想知道，为什么对1645年达尔罕喇嘛赴俄国一事未作出反应，对“派人去阿勒坦汗外之事宜，尚无音讯”⁽³³⁾。这一次，阿勒坦汗俄木布额尔德尼

虽一再请求俄国从以前去过的使臣中派一个人去，结果还是没有如愿以偿。

当俄水布额尔德尼致力于恢复和莫斯科的关系时，俄国政府却在和车臣汗硕垒发生接触。最早依次访问鄂尔浑河流域的车臣汗营地和色楞格河流域的车臣汗女婿，封臣图鲁海塔布囊领地的俄国人，是哥萨克十人长 K. 莫斯科维京和火枪兵 J. 库拉科夫。与他们同行的还有几支小队伍，是由哥萨克头目 B. 科列斯尼科夫于 1646 年和 1647 年派出的。他们从安加拉河上游河口南下，去“寻找发现新土地”和“开发银矿”。B. 科列斯尼科夫本人则和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 1664 年装备的去外贝加尔地区的俄国考察队主力一起，一直没有离开他建立的小寨子，这个地方后来发展为上安加尔斯克城。

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因长时期没有得到 B. 科列斯尼科夫的消息⁽²⁴⁾，以为他已去世，就又派出一支以叶尼塞斯克军役贵族伊凡·波哈鲍夫为首的新队伍，开往外贝加尔地区。N. 波哈鲍夫在东进途中，先会见了图鲁海塔布囊，而后进入车臣汗的营地⁽²⁵⁾。

1647 年 9 月 29 日，B. 科列斯尼科夫及其队伍回到叶尼塞斯克，和他一起到达的还有哥萨克十人长 K. 莫斯科维京诺夫。后者 1647 年 10 月 6 日在叶尼塞斯克官署的咨询谈话记

录，是一份确凿可信的重要证明材料，因为他是车臣汗领地情况的目睹者。⁽³⁶⁾ K. 莫斯科维京诺夫的咨询谈话记录，和叶尼塞斯克军政长官中，波利宾致西伯利亚衙门的一份详述B. 科列斯尼科夫和K. 莫斯科维京诺夫出使报告，（这两份出使报告没有保存下来）⁽³⁷⁾ 内容的英文一样，有许多关于蒙古人的很有意思的情况。这个文献的内容，到目前为止，只有在H. 奥格洛勃林的转述中披露过。⁽³⁸⁾ 因而它的原件的意义就更是重要了。

过了一年左右，在1648年10月20日，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H. M. 勃尔蒂科夫在官署向M. 波哈鲍夫和A. 库拉科夫详细询问了会见车臣汗的情况⁽³⁹⁾。11月1日，他又发了一份致外务衙门的英文，报告说，与M. 波哈鲍夫一起抵达托博尔斯克的车臣汗与图鲁勃塔市囊的第一批使臣玛诺克、乌勒泰多尔济和加尔木以及他们的同僚要出发去莫斯科⁽⁴⁰⁾。

蒙古使团在莫斯科受到隆重的节日般的礼遇，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依洛维奇在外务衙门接见了使团，并赠送了厚礼。他们从莫斯科出发的日期略为推迟了一些，因为有一名使臣突然死去。但使臣们出发去托博尔斯克的日期不会迟于1649年3月15日。上石决定派出第一个正式的俄国使团，与他们一起去车臣汗营地。这个使团由组织工作委托托博尔斯克军政长

官B. E. 舍列麦捷夫负责。外务衙门下达给托博尔斯克勤公文中指出，沙皇决定“接受车臣王及其女婿图鲁海塔布囊^{（43）}加入俄国国籍，并受他的保护”。因此谕令组织相应的俄团去车臣汗营地^{（41）}。俄团的成员有书吏瓦西里·恰普林、通译潘菲尔·谢苗诺夫，並有若干军役人员护送。俄团由托博尔斯克军役员米雅罗费伊·扎勃洛茨基率领^{（42）}。

可是，1650年10月7日夜裡，在去蒙古兀鲁思的途中，一群来历不明的人袭击了俄团，险些全部被歼，倖存的只有通译П. 谢苗诺夫和两名军役人员。П. 谢苗诺夫决定继续完成使命。他在图鲁海塔布囊和已于1650年去世的车臣汗硕垒的儿子阿通可敦的营地居留了很长时间，1652年9月才回到俄国。

关于出使阿通可敦和图鲁海塔布囊营地的情况，П. 谢苗诺夫向叶尼塞斯克官署呈送了一份情况报告，原件保存了下来^{（43）}。是一份极引人注目的光辉文件。这份报告不仅谈了Я. 扎勃洛茨基俄团行止和被歼的情况，而且还介绍了十七世纪蒙古人生活的许多情景和事例。遗憾的是，П. 谢苗诺夫在不久后（1653年1月）呈送托博尔斯克军政长官B. И. 希尔科夫的出使报告，没有保存下来，但是在B. И. 希尔科夫致外务衙门的复文中，

介绍了这份出使报告的内容⁽⁴⁴⁾。这份复文叙述了П. 谢苗诺夫在托博尔斯克官署的咨询谈话。因而，它和П. 谢苗诺夫的情况报告的意义就更为重要了。

1650年车臣汗硕垒去世后蒙古兀鲁思动荡不安，俄国派出的П. 扎勃洛茨基使团又遭遇不幸，因而使蒙古这一分地区和俄国在十七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暂时中断了使臣往来。俄国政府和金卫拉特汗额尔德尼巴图尔珥台吉（1635—1653）之间的使臣交换，本来一直很活跃，在额尔德尼巴图尔珥台吉在位的整个期间内，来往简直没有断过，即使这样，在这几年也同样出现过一些中断的情况。

从1635年开始，正如一个文件所谈的：“使臣在我们之间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我们要求什么，就答应什么”⁽⁴⁵⁾。据我们统计，曾九次遣使至巴图尔珥台吉处：1636年前往的是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Т. 彼特罗夫⁽⁴⁶⁾；1640年——又是托博尔斯克的军役贵族兹希·列表佐夫⁽⁴⁷⁾；1641年底至1642年初——托博尔斯克哥萨克骑兵拉里昂·纳索诺夫⁽⁴⁸⁾；1643年——格里戈里·伊利英⁽⁴⁹⁾；1644年——火炮兵百人长弗拉基米尔·克利亚皮科夫⁽⁵⁰⁾；1646年——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П. 阿尔申斯基⁽⁵¹⁾；1649年——军役人员中。

伊凡诺夫和S.雅克希古洛夫⁽⁵²⁾。1651年——又是弗拉基米尔·克利亚皮科夫⁽⁵³⁾；最后一次在1651——1652年，前往的是托博尔斯克军役贵族伊凡·巴伊加切夫⁽⁵⁴⁾。

在整个这段时间内，除了去和卫拉特汗进行各种问题正式谈判的使团外（这方面情况下还要谈到），还有许多军役人员络绎不绝地去巴图尔珲台吉处和亚梅什湖。他们或是和巴图尔珲台吉个人会见，或是和他派遣的人员会见。这些军役人员，有的是去完成西伯利亚军政长官交给的具体任务，有的是送礼物去，或者只是去护送回国的蒙古使臣。这些人的记述和保存下来的咨询谈话记录，无论是原件，或是西伯利亚军政长官送莫斯科的报告中对这些文献的叙述部分，其价值并不比俄国使臣出使报告的材料逊色。

譬如说，在1634年，塔拉军政长官派遣中、普洛特尼科夫前去巴图尔珲台吉营地，对解放被他的属臣固始台什同年虏掠的一百户巴拉巴草原鞑靼人一事表示感谢⁽⁵⁵⁾。1640年，托博尔斯克军役人员K.阿勃拉莫夫和鞑靼牧民K.伊捷耶夫护送蒙古使臣乌鲁斯凯时，也到过巴图尔珲台吉营地⁽⁵⁶⁾。

1641年，军役人员谢缅·涅乌斯特罗耶夫及其同僚受到巴图尔珲台吉的接见⁽⁵⁷⁾；1642年，受到接见的有托博尔